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6.02.001

南方丝绸之路与川滇民族文化交融研究

杨甫旺, 张 玫

摘要: 南方丝绸之路作为多向立体的交通网络, 是川滇民族文化交融的核心载体。这条古道以其悠久的历史、复杂的路网与独特的枢纽地位, 构建了川滇民族物资交流、民族迁徙、文化互动的重要通道和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文化走廊, 推动了各民族从表层物质到深层精神的全方位交融。南方丝绸之路推动川滇民族文化交融的主要路径包括人口流动、商品交换、文化传播。这三重路径彼此耦合、协同演进, 共同建构起川滇地区民族文化交融的系统性整体。

关键词: 南方丝绸之路; 川滇地区; 民族文化; 交融共生

中图分类号: G127; D633; F1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6)02-0001-10

收稿日期: 2026-01-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文化互嵌与交融研究”(项目编号: 25XMZ0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西南各民族‘南京柳树湾’祖源叙事与中华文化认同研究”(项目编号: 25XMZ093)。

作者简介: 杨甫旺(1962—), 男(彝族), 云南永仁人, 楚雄师范学院二级研究员, 硕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彝族历史文化, E-mail: yangfuwang@vip.sina.com; 张玫(1984—), 女(彝族), 云南华宁人, 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 西南少数民族文化。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南方丝绸之路是与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并存的古代对外交通线路, 以其悠久的历史、复杂的路网与独特的文化交融景观, 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见证。相较于北方丝绸之路的沙漠驼铃, 南方丝绸之路穿行于川滇崇山峻岭之间, 串联起成都平原、云贵高原与中南半岛、南亚次大陆, 形成了“内接中原、外联异域”的交通格局。这条古道最迟在公元前4世纪便已开通, 比北方丝绸之路早约200~300年, 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川滇地区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核心路段与关键枢纽, 聚居着彝、白、藏、傣、纳西、傈僳等数十个民族, 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自古道开通以来, 川滇民族便在这条交通线上展开了持续不断的交往交流, 从商贸互易到信仰传播, 从习俗借鉴到语言融合, 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

国内学界对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童恩正率先提出“南方丝绸之路”的学术概念,并引发学界关注^[1]。此后,学者围绕路线考证、考古发现、贸易往来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明确了其“国内联通南北、国际衔接南亚东南亚”的交通格局和作为“经济大动脉”的历史功能。在民族文化交融领域,李绍明、蓝勇等学者指出,南方丝绸之路构建了西南民族地区“互通的区域”^{[2]107-109},促进了各民族的人口、商品与文化流动,形成了合作共生的社会格局。但现有成果多局限于单一民族或局部区域,缺乏对南方丝绸之路作为整体文化通道的系统性研究。国外学者则主要集中于中西交通史、跨境文化交流等领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最早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其研究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后续探索奠定了基础^[3]。此外,日本学者菅原寿清、山田直巳等关注南方丝绸之路对中南半岛与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影响,探讨了玉石贸易、宗教传播等领域的跨境交流,但对川滇民族内部的文化交融关注较少。

总体来看,国内外有关南方丝绸之路与川滇民族文化交融研究有一定的基础,但仍存在不足:一是研究视角较为分散,缺乏对南方丝绸之路与川滇民族文化交融的系统性研究;二是研究方法多以文献梳理为主,实地考察与跨学科研究不足;三是对文化交融的内在机制与当代价值挖掘不够深入。本文将通过整合文献研究、案例分析与比较研究,构建南方丝绸之路与川滇民族文化交融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

二、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脉络与川滇人文地理格局

(一) 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脉络

南方丝绸之路是指以中国西南地区为核心,联通中原、南亚、东南亚的古代交通网络,又称“西南丝绸之路”“蜀身毒道”等,它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形成了多向立体、互联互通的道路网络,其中的西线“蜀身毒道”与南线“步头道”“进桑道”是贯穿川滇地区的核心路段。考古资料显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象牙、海贝等物品,部分来自南亚、东南亚地区,表明当时蜀地与外界已存在间接的贸易往来。战国时期,蜀地商人通过民间贸易,开辟了从成都经云南至缅甸、印度的商贸通道,即“蜀身毒道”的雏形。方国瑜先生认为,蜀身毒道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已初步开通^{[4]338-369}。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常頔开凿“五尺道”,连接蜀地与云南曲靖地区,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夜郎,开辟“夜郎道”,并设置犍为郡、益州郡等,将南方丝绸之路纳入官方管理体系,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川滇民族文化的交流。南诏国、大理国等地方政权的崛起,加强了与中原地区、东南亚国家的联系,使得丝路贸易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这一时期,蜀锦、茶叶、铁器等商品经丝路大量输出,而珠宝、玉石、香料等异域特产则不断输入,同时佛教、道教等宗教也沿丝路传入川滇地区,与本土信仰融合共生。明清时期,南方丝绸之路的商贸功能进一步强化,滇缅边境的盐棉贸易、玉石贸易日趋繁荣,八莫、江头城等边境城镇成为重要的贸易枢纽,同时中原地区的大量移民进入川滇,推动了民族文化的深度交融。

(二) 川滇地区的民族分布与文化生态

川滇地区是我国民族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聚居着汉、彝、白、藏、傣、纳西、傈僳、苗、回等数十个民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征:在宏观层面,各民族广泛分布于川滇高原的山区、坝区、河谷等不同地理单元,形成相互交错的分布格局;在微观层面,各民族又在特定区域形成聚居村落,保留着自身的文化传统。这种分布格局的形成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发展密切相关。自古道开辟以来,中原移民、川滇世居民族与跨界族群通过迁徙、商贸、戍边等方式不断互动,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5]的分布状态。例如,彝族主要分布在四川凉山、云南楚雄等地,白族集中在云南大理地区,藏族聚居在四川甘孜、云南迪庆等地。但在丝路沿线的城镇与交通要道,各民族杂居现象十分普遍,如大理地区便生活着白、汉、彝、回、纳西等多个民族,形成了多元共生的社会格局。川滇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民族分布,造就了多元一体的文化生态格局。各民族在适应高原、山区、河谷等不同地理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同时,南方丝绸之路的交通网络打破了各民族的地域隔阂,促进了文化的相互传播与融合。在长期的交往中,各民族文化既保留了自身的核心特质,又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形成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6][72]}的文化生态。

三、南方丝绸之路推动川滇民族文化交融的路径

(一) 商品交换:物质交换与文化交流的基础

南方丝绸之路川滇段的商品交换以“互补性”为特征,四川盆地的丝绸、茶叶、瓷器、铁器等与云南地区的盐、铜、药材等资源,以及南亚、东南亚的象牙、犀角、香料等商品形成了强烈的互补性,推动了跨区域贸易的繁荣。这种物质交换不仅满足了各民族的生产生活需求,更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融合。

从贸易商品来看,丝绸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标志性商品,不仅是物质财富的象征,更承载着中原文化的理念。四川的蜀锦、蜀绣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云南后,被当地民族借鉴改造,融入民族特色,如彝族的“火纹锦”、纳西族的“东巴锦”,在保留丝绸材质优势的同时,加入了民族图腾与图案,成为文化交融的结晶。茶叶贸易则推动了茶文化的传播,四川蒙山茶、云南普洱茶通过丝绸之路流通,形成了独特的“茶马古道”文化^[7]。此外,铁器、青铜器等生产工具的传播,推动了川滇民族生产方式的进步,如云南少数民族借鉴中原的冶铁技术,改进农业生产工具,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而生产方式的变革又进一步推动了生活习俗、社会组织等方面的交融^{[8][105]}。原产于印度的棉花、甘蔗、黄瓜和越南的龙眼、槟榔、菖蒲、薏米等农作物也可能是通过这条路线进入中国的,成为中国南方地区的重要农业物种^{[9][572]}。

南方丝绸之路沿线的经济活动是双向展开的,盐、茶、丝绸等生活日用品和马匹、铜铁金银等战略物资的大规模生产和贸易活动,推动了多层次、区域性的经济网络逐渐形成,西南地区与内地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在与东南亚、南亚及中国内地之间的经济贸易过程中产生了极为复杂多样的地区市场层级体系,并进一步重塑了西南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随着南方丝绸之路的发展,路线不断扩展和商贸活动日益频繁,西南地区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形成了互惠互利的经济依存关系。在长期的经济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南方丝绸之路以经济的互利共赢纽带加强了西南边疆与内地、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之间的联系,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交往交融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各民族之间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的形成,推动了川滇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传播和相互吸收,加速了各民族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最终形成了多民族共生互补的经济发展格局。

(二) 人口流动:民族互动与文化融合的直接动力

南方丝绸之路川滇段贯穿多民族聚居区,复杂的地理环境与频繁的政权更迭,推动了各民族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从历史上看,川滇地区的人口迁徙主要包括氏羌系民族的南下、百越系民族的西迁、汉族的入滇、吐蕃的东进等,这些迁徙活动打破了民族间的地理隔阂,促进了文化的直接碰撞与融合。

早在新石器时代,氏羌民族就从西北甘青地区向西南迁徙,进入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与当地土著

民族融合,形成了彝族、纳西族、傈僳族等民族。在迁徙过程中,氏羌民族将游牧文化与高原农业文化相结合,同时吸收了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元素。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在川滇地区设立郡县,大量汉族官吏、农民、工匠等进入西南地区,带来了中原的农业技术、手工业技艺、制度文化与生活习俗^{[10]84}。如汉族的建筑技术传入后,被彝族、白族等民族借鉴,形成了“四合五天井”“三坊一照壁”等融合性建筑形式。此外,汉族与当地民族通婚,进一步促进了血缘与文化的融合,如白族的形成与汉族、氏羌、百越等民族的融合密切相关。至唐代,吐蕃势力进入云南西北部,与南诏政权交往密切,藏族文化与纳西族、彝族等民族的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如纳西族的服饰吸收了藏族服饰的元素,形成了宽袍大袖的风格。

(三) 文化传播: 精神文化交融的核心纽带

南方丝绸之路作为自古以来西南地区与南亚东南亚民族迁徙、文化互动的重要通道和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文化走廊,涵盖了“以汉语、藏缅语两大族群以中国西南地区为中心实现迁徙、融合、交流与互动关系”的“汉藏走廊圈”^[11],在长期的交往交流过程中产生了极为复杂多样的文化变迁,并进一步重塑了西南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展现了边疆与内地之间多民族文化共生互补的共同体形成与巩固的过程。

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与变迁为沿线各地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更为东亚和东南亚、南亚文明互鉴搭建了桥梁。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文明就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传播到南亚、东南亚地区,比如铜鼓作为“权威和财富象征”^[12],其产生高度依赖青铜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据学者考证,中国万家坝型铜鼓是世界上最早的铜鼓,原始形态的铜鼓集中发掘于楚雄、弥渡、祥云和昌宁等滇中偏西地区,石寨山型铜鼓深受万家坝型铜鼓的影响,盛行于越南红河流域及其邻近沿海地区的越南东山铜鼓的出现时间则略晚于中国石寨山型铜鼓,且器型设计及铸造工艺方面展现了骆越与滇、勾町等南方丝绸之路沿线西南夷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13]。而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发现的铜鼓受到中国石寨山型铜鼓和越南东山铜鼓的深刻影响,甚至塑造了整个中南半岛青铜文明的发展历程^{[14]278}。可以肯定地说,南方丝绸之路对铜鼓文化在南亚东南亚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样,越南出土的牙璋风格和制作形式一类近似于龙山文化类型,另一类近似于二里头、郑州和三星堆类型,饶宗颐先生认为,牙璋在越南地区的流行说明了早期越南文化与中原文化、古蜀文化之间的联系,同时也证实了南方丝绸之路沟通多元文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脉络^{[15]1-3}。

秦汉以来,随着中原王朝将郡县制、汉字、儒学以及稻作农业生产技术等文化成果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传播到东南亚等地区,中华文明逐渐对周边国家产生巨大影响。金属农具和牛耕技术的使用逐渐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渗透入东南亚地区,至东汉时,“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遵之礼仪”“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16]2836}。与此同时,南亚东南亚地区的部分文化传统也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反向传入中国,对中华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如佛教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从印度经缅甸直传至云南地区,然后北上至四川。四川乐山、彭山等地的崖墓中发现的东汉佛像表明,南方丝绸之路是早期佛教传入中国的重要通道。四川作为道教最早教派五斗米道的发源地,吸纳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俗好巫鬼禁忌”^{[16]2845}的民俗传统,并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在川滇地区广泛传播,形成了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推动了精神文化的深度交融。东汉时期,佛教从印度经缅甸传入云南,再传入四川。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川滇地区迅速发展,出现了众多寺庙石窟,如四川的乐山大佛、云南的剑川石钟山石窟等,这些石窟艺术既保留了印度

佛教艺术的风格,又融入了中原文化与当地民族文化的元素。道教传入川滇地区后,与当地民族的本土宗教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道教文化。道教中的神仙信仰、风水观念、养生之道等元素,被彝族、纳西族等民族吸收,融入本土宗教信仰中。此外,道教在川滇地区的传播还促进了建筑、艺术等文化元素的交融,如云南巍宝山等道教名山的建筑既保留了道教建筑的传统风格,又融入了当地民族的建筑特色。

(四) 政权互动:制度文化交融的政治保障

自汉武帝经略西南开始,中原王朝继承和发扬了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17]199}的思想,以“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18]2914}“怀柔远人”^{[19]2050}“来则拒,去则勿逐”^{[20]4400}“蛮夷羁縻以属,不宜与中国同法”^{[21]3176}的制度来联系、控制西南民族地区,“蛮夷事,在羁縻,……朝廷第当选重臣知治体者,付以边寄,兵宜止”^{[22]4164},以“因其俗而抚驭之”^{[23]1312}的政治笼络手段,在西南地区交通要道沿线设置郡县,而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羁縻府州,通过郡县制和羁縻府州并行的方式将西南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的统一管理之下。同时通过文化上的吸引和中华文化的超级向心力,使周边的“夷”接受“华夏”族的文化、习俗,逐渐融合周边之“夷”,使其成为“‘天子’‘德化天下’的臣民”^[24],标志着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地区逐渐融入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中原官僚制度、法律制度、赋税制度在西南地区的逐步施行,推动了当地民族制度文化的转型。如在川滇地区推行的“郡县制”,取代了当地民族的部落联盟制度,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制度文化的统一。南诏、大理国等地方政权在借鉴中原制度的同时,也保留了本民族的制度特色,形成了融合性的制度体系。如南诏国的官制既借鉴了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设立了“清平官”“六曹”等官职,又保留了彝族的“诏”“都督”等传统官职^{[25]187-195}。

此外,中原王朝还在川滇地区推行“移民实边”“屯田制度”,将中原的农业生产制度、社会组织制度传入当地,推动了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元朝中央政府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地区,如中庆、大理、永昌、楚雄、姚安、建水、安宁、澄江、曲靖等交通要道、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及商贸重镇等地兴建文庙,供奉孔子,规定每年春、秋两季进行祭祀,同时设立“庙学”,推动儒家思想成为西南地区的统治思想,汉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逐渐突破特定阶层和群体,逐渐发展演化为西南地区的主流文化。如明代大理地区已经形成了具有强烈“华夷中间人”色彩、游走于地方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庞大的少数民族儒生群体和家族势力,“(白人)滇郡及迤西诸郡强半有之,习俗与华人不甚远,上者能读书,其他力田务本,或服役公府,庶几一变至道也”^{[26]20}。永乐九年,云南正式举行乡试,全省取儒生二十八名,其中六人来自大理府。如前文所讲,这些地方儒生在取得功名后,或被选为儒官,或以贡生身份被选拔为教职,这些地区逐渐形成了自发的“儒学化”浪潮,这些儒生也逐渐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四、川滇民族文化交融的具体表现

(一) 生产工艺交融:器物、手工技艺与生产方式的互鉴

南方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推动了川滇民族生产生活器物的深度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生面貌。在生产工具方面,四川盆地的铁器制作技术传入云南后,与当地的青铜铸造技术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金属工具体系。如云南石寨山遗址出土的铁剑、铁锄,既保留了中原铁器的形制特点,

又融入了滇文化的装饰风格。同时,川滇本土民族的农业技术也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向外传播。彝族和哈尼族的梯田开垦技术、傣族的水稻种植技术、纳西族的果树栽培技术等在线各民族中广泛传播,形成了相互借鉴的农业生产格局。

纺织技艺的交融尤为突出。早在汉晋时期,南方丝绸之路所经的永昌郡等地以木棉(又称攀枝花)为原料所织的桐华布就被蜀地商人贩运至缅甸、印度等地,被当地人误称为“蜀布”。原产于成都平原的蜀锦、蜀布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核心商品,其纺织技术沿南方丝绸之路传入云南地区,被白族、彝族等民族吸收借鉴,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纺织工艺。例如,白族的扎染技术便吸收了蜀锦的染色工艺,同时融入自身的审美理念,成为享誉中外的传统手工艺。此外,金属加工、玉石雕刻等技术也在川滇民族间广泛传播。中原地区的铁器铸造技术传入川滇后,与本地的青铜铸造技术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金属加工工艺,生产出的铁锅、刀具、铜器等商品不仅满足了本地需求,还通过丝路远销南亚、东南亚。如云南省陇川县户撒乡的阿昌族深受屯戍当地的明代军队先进的兵器制造技术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户撒刀锻造工艺和博大精深的刀文化体系。

物质文化的交融还直接推动了川滇民族生产方式的相互影响,形成了“共性与个性并存”的格局。水稻种植技术从四川传入云南后,与当地的梯田农业结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水利灌溉系统,形成了适应立体生态系统的多元稻作文化类型,具体可分为低热河谷地区的水田稻作文化、低热层山地梯田稻作文化、中暖层坝区的水田稻作与山地旱作文化、金沙江河谷地区灌溉水田稻作文化等多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川滇地区各民族逐渐形成了傍水而居的村落分布格局和协调人地关系的复杂社会系统。随着稻米成为川滇多民族的主食和副食、饮品和零食制作的主要原料,进而形成了“多元一体”的稻米饮食文化传统。如可能源于明代的川滇地区各民族擅制稻米制品且喜食“米粉”“米线”的饮食偏好甚至影响到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

川滇地区多盐井,如唐代南方丝绸之路川蜀道西路——清溪道所经定笮(今盐源)、临邛(今邛崃)、白羊井(今大姚盐丰)、琅井(今云南禄丰)、黑井(今云南禄丰)等都是古代著名盐井,盐井的分布直接促成了川滇地区多元的地域性食品腌制工艺体系,如四川地区以重盐打底、香料辅助的复合腌制工艺为主;云南则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多元融合型的腌制工艺,如滇西及滇西北地区以盐腌为基础、擅用自然发酵为主,滇中地区则融合了滇西地区的自然发酵与四川的复合调味,追求香、辛、甜平衡的复合调味,并发展出蔬菜与稻作文化深度交融的“鲜”生产和食用传统;滇南及滇东南则形成了以发酵酸味为主、擅用新鲜野生食材的多元融合的腌制工艺。同时,各民族又相互借鉴烹饪技艺,四川的麻辣口味与云南的酸辣风味融合,形成了滇东北、川南地区“麻辣鲜香”的复合口味。南方丝绸之路茶叶贸易则催生了川滇地区共享的饮茶习俗,藏族的酥油茶、白族的三道茶、彝族的烤茶在制作工艺上相互借鉴,形成了“煮茶、烤茶、泡茶”多元并存的饮茶文化。

在建筑文化方面,在南方丝绸之路的影响下也呈现出兼容并蓄的鲜明特征。藏族的白藏房以白色黏土为外墙,屋顶呈平面状,兼具藏族碉房与汉族民居的建筑特色。汉族的“四合院”与彝族的“土掌房”、白族的“三坊一照壁”相互影响,在川滇交界地区形成了“四合五天井”“一正两厢带耳房”的融合性建筑,既保留了汉族建筑的中轴对称布局,又吸收了少数民族适应山地气候的土木结构、斜坡屋顶设计,体现了文化的多元共生。

在服饰文化方面,面料、款式、装饰的交融尤为明显。丝绸、棉布等面料的跨区域传播,使川滇民族的服饰材质更加丰富,彝族的“擦尔瓦”从传统的羊毛材质扩展到丝绸、棉布混纺,白族的“凤凰帽”采用蜀锦作为装饰面料,既提升了服饰的质感,又体现了文化的交流。款式上,汉族的对襟、斜襟设计与少数民族的长袍、百褶裙结合,形成了融合性服饰,如纳西族的“七星披肩”在剪裁上借鉴了汉族披肩的简洁,在装饰上保留了本民族的七星图腾;汉族的旗袍元素融入彝族服饰,形成了“短款旗袍式上衣+百褶裙”的款式,成为文化交融的鲜活例证。装饰上,各民族共享银饰、玉石、刺绣等装饰工艺,彝族的银质头饰吸收了白族的篆刻技艺,白族的刺绣背包借鉴了彝族的火纹图案,形成了“工艺互通、符号共享”的服饰文化。

(二) 精神文化交融:信仰、艺术与价值观的互鉴

南方丝绸之路作为宗教传播的走廊,推动了川滇民族文化的深度交融,形成了“多教共存、相互渗透”的格局。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经云南进入四川后,与中原佛教、地方民族信仰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佛教流派。大理国时期,“释儒结合”成为主流,佛教教义与儒家的伦理道德、少数民族的祖先崇拜相互融合,形成了“事人如事天,事天如事佛”的信仰理念^{[27][30]}。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也沿南方丝绸之路传入川滇地区,与本地信仰融合共生。道教的神仙体系吸收了川滇民族的自然神、祖先神,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道教信仰。民间信仰中的祈福、祭祀仪式,也常常融合了佛教、道教与本土信仰的元素,体现了川滇民族宗教信仰的包容性与交融性。土主信仰最初是川滇本土民族的自然神崇拜,随着南方丝绸之路的发展,逐渐从村落神演变为区域神,再发展为跨境神。在这一过程中,土主信仰吸收了汉族的土地神崇拜、佛教的大黑天神信仰、彝族的祖先神崇拜等多种元素,形成了多元融合的信仰体系^[28]。

语言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在南方丝绸之路的推动下,实现了川滇民族语言的广泛互动与互鉴。各民族在商贸往来、人口迁徙、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借用语言元素,形成了语言融合的丰富景观,包括词汇借用、语法影响、双语现象等多个层面。如,彝族语言中吸收了大量汉语的农业术语、手工业词汇,如“犁”“耙”“纺织”“铸造”等。同时,汉族语言也吸收了川滇民族语言的部分词汇,如“坨坨肉”“乳扇”“氉氉”“锅庄”等,丰富了汉语的词汇体系。此外,在长期的语言接触中,各民族语言的语法结构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些共同的语法特征。例如,彝族语言与汉语在语序、虚词使用等方面相互影响,部分彝族方言的语序逐渐向汉语靠拢;白族语言与纳西族语言在助词、语气词的使用上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体现了语言的交融特征。

川滇民族的文学艺术在丝绸之路的连接下相互借鉴,形成了多元一体的艺术格局。民间文学方面,神话、传说、歌谣的跨民族传播与融合尤为显著。彝族的“支格阿鲁”神话、白族的“望夫云”传说、汉族的“大禹治水”神话在川滇地区广泛流传,相互影响,形成了融合性的文学叙事。歌谣方面,汉族的民歌小调与彝族的“海菜腔”、白族的“大本曲”、纳西族的“白沙细乐”相互融合,形成了“曲调互通、歌词互译”的民歌体系。各民族的乐器、舞蹈动作、表演形式等相互借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例如,彝族的月琴、白族的三弦、纳西族的洞箫等乐器,在演奏技巧上相互学习,形成了共同的音乐语言;藏族的锅庄舞、彝族的左脚舞、白族的霸王鞭舞等舞蹈,在动作设计上相互融合,部分舞蹈动作具有明显的共性特征。绘画与雕塑艺术则延续了器物文化的交融特征,彝族的漆器绘画吸收了汉族的工笔技法,同时保留了彝族的图腾纹样;四川的蜀绣、云南的扎染在图案设计上相互借鉴,蜀绣中出

现了彝族的火纹、白族的莲花纹，扎染作品中融入了汉族的牡丹、凤凰图案。此外，川滇各民族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观念，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注重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如梯田开垦、轮作制度等，展现了独特的生态智慧。

（三）社会生活交融：婚俗传统与公共活动的共享

社会生活是民族文化的鲜活载体，包括婚俗、节庆、社会组织、日常交往等多个方面。南方丝绸之路推动了川滇民族社会生活的全方位交融，形成了互嵌式的社会格局，促进了各民族的情感联结与身份认同。

婚俗作为民族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南方丝绸之路的影响下，发生了显著的交融与演变。川滇民族的婚俗既保留了自身的传统特色，又吸收了其他民族的婚俗元素，形成了多元融合的节日文化景观，同时婚俗的演变也反映了民族交往交流的深度。彝族的婚俗在保留“抢亲”“哭嫁”等传统仪式的同时，吸收了汉族的“订婚”“拜堂”等环节；白族的婚俗则融合了汉族的“三书六礼”与彝族的“拦门酒”仪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婚姻流程；藏族的婚俗在保留“献哈达”“喝青稞酒”等传统习俗的基础上，吸收了汉族的“婚礼庆典”形式，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情感交流。此外，跨民族婚姻在川滇地区日益普遍，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形式。汉族与彝族、白族、藏族等民族的跨民族婚姻，不仅促进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文化交流，更推动了各民族的血缘融合与文化认同。

节日庆典作为各民族公共生活的集中体现，在南方丝绸之路的推动下，川滇民族的传统节庆活动形成了共享与融合。各民族的传统节日相互传播与影响，部分节日成为沿线各民族共同庆祝的文化盛典，节庆活动中的习俗、仪式也相互借鉴，形成了多元融合的节日文化景观^[29]。大理三月街最初是白族的贸易集会，如今已发展成为白、汉、彝、回、纳西等多个民族共同参与的盛会，成为南方丝绸之路沿线民族商贸交流与文化共享的重要平台。节庆活动中的赛马、射箭源自彝族、藏族的传统习俗，对歌、舞蹈则融合了白族、纳西族的艺术元素，体现了多民族节庆文化的交融特质。彝族的火把节不仅在彝族地区广泛庆祝，还传播到白族、纳西族、傣族等民族聚居区，成为川滇地区各民族共同参与的重要节日；傣族的泼水节则吸收了汉族的春节元素，形成了辞旧迎新、祈福纳祥的共同主题，成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节日。这些共享的节日文化不仅丰富了各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增强了民族间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联结。

（四）社会结构的互嵌：组织形态、关系网络与互动逻辑的融合

南方丝绸之路推动了川滇地区各民族社会组织与交往模式的交融，形成了“互嵌式”的社会格局。各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相互影响，交往模式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商贸往来扩展到生产合作、文化交流、社会互助等多个层面，促进了各民族的深度融合。川滇民族的基层社会组织既保留了自身的传统特色，又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治理经验。例如，彝族的“家支”制度、白族的“村社”组织等，在长期的交往中相互借鉴，形成了兼具民族特色与区域共性的基层治理模式。明清时期，中原地区的保甲制度传入川滇后，与当地民族的社会组织结合，形成了新的基层治理体系，既加强了中央政权对西南地区的管理，又保留了民族自治的传统。此外，民间组织在民族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商会、手工艺行会等，这些组织跨越民族界限，成为各民族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例如，滇缅边境的玉石商会聚集了汉族、傣族、景颇族等各民族商人，通过制定行业规范、共享商业信息，促进了跨境贸易的繁荣。

交往模式的交融则体现在族际通婚、日常交往、生产合作、社会互助等方面。在日常交往中，川滇

民族通过邻里互助、亲友往来、节庆聚会等形式,形成了紧密的社会联系。例如,在楚雄、大理、丽江等丝路沿线城镇,各民族群众杂居共处,邻里之间相互帮助、相互尊重,形成了和谐融洽的邻里关系;在农业生产中,各民族相互协作,共同开垦土地、修建水利设施,形成了“换工”“互助”等合作模式;在应对自然灾害、疾病等突发事件时,各民族更是团结一心、互帮互助,展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30]的深厚情谊。

可以看出,长期以来川滇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着一定的互动逻辑,即以多样的经济交流为驱动力,以人口流动为重要引力,以文化交流交融为推动力,促使该区域内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呈现出双向互动的特点。随着文化交往交融的程度日益加深,其社群关系、宗教礼仪、文化价值等方面逐渐展现出多样性中蕴含统一性、统一性中展现多样性的复杂模式,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交往交融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区域内各民族之间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的形成,推动了各民族文化的传播和相互吸收,加速了各民族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最终形成了多民族共生互补的发展格局。

五、结语

南方丝绸之路作为多向立体的交通网络,是川滇民族文化交融的核心载体。这条古道以其悠久的历史、复杂的路网与独特的枢纽地位,构建了川滇民族人口流动、商品交换、信仰传播的通道,推动了各民族从表层物质到深层精神的全方位交融。在物质文化层面,生产工具、服饰、饮食等领域实现了技术传播与风格融合;在精神文化层面,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价值观念等方面形成了互鉴共生的格局;在社会生活层面,婚俗、节庆、社会组织与交往模式等领域呈现出深度互动的态势。南方丝绸之路推动川滇民族文化交融的主要路径包括商品交换、人口流动、文化传播。这三重路径彼此耦合、协同演进,共同建构起川滇地区民族文化交融的系统性整体。南方丝绸之路与川滇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生动见证。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这段历史的价值,对于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推动西南地区繁荣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J].文物,1983(9):73-81.
- [2] 李绍明.南方丝绸之路滇越交通探讨[C]//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8.
- [3] 王健.李希霍芬中国内陆至边疆商道考察与“丝绸之路”的命名——以《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为据[J].江苏社会科学,2020(4):230-240.
- [4] 方国瑜.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C]//方国瑜文集:第4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 [5]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1-19.
- [6] 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
- [7] 王军涛,张建强.清代咏藏诗视域下的茶马古道文化谱系:和而不同[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76-84.
- [8] 何耀华.云南通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 [9] 葛兆光.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中[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
- [10] 王文光,朱映占,赵永忠.中国西南民族通史:上[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
- [11] 郭建斌,杨立柱.“藏缅走廊”刍议[J].开放时代,2022(1):211-223.
- [12] 汪宁生.试论中国古代铜鼓[J].考古学报,1978(2):159-192.

- [13] 杨勇.论古代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联系——以考古发现的青铜器为中心[J].考古学报,2020(3):337-368.
- [14] 李昆声,黄德荣.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铜鼓[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9.
- [15] 饶宗颐.由牙璋略论汉土传入越南的遗物[C]//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16]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7] 孔子.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8] 房玄龄.晋书:卷一百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9] 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一百七十[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20]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1] 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2] 宋濂.元史:卷一百八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23] 王溥.唐会要:卷七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4] 柳岳武.“一统”与“统一”:试论中国传统“华夷”观念之演变[J].江淮论坛,2008(3):150-155.
- [25] 詹全友.南诏大理国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
- [26]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32册[M].台北:艺文书局,1977.
- [27] 李晓斌,王兴宇,马贤余,等.南诏国大理国文化交流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21.
- [28] 罗宝川.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川滇沿线土主信仰研究述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6):69-73.
- [29] 王万平.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和节庆共享——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J].民族学刊,2019,10(4):17-26+102-105.
- [30]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9-09-27)[2025-12-23].https://www.qstheory.cn/yaowen/2019-09/27/c_1125049226.htm.

A Study on the Ethnic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Sichuan and Yunnan via the Southern Silk Road

YANG Fuwang, ZHANG Mei

Abstract: The Southern Silk Road, as a multidirectional and three-dimensional transportation network, is the core vehicle for ethnic cultural integration between Sichuan and Yunnan. With its long history, intricate route system, and unique pivotal status, this ancient road has constructed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material exchange, ethnic migration,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in Sichuan and Yunnan, as well as a cultural corridor for the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of multiple ethnic groups, facilitating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ranging from superficial material aspects to profound spiritual dimensions. The main paths through which the Southern Silk Road promoted this ethnic cultural integration include population mobility, commodity exchange,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These three paths are coupled with each other, evolve collaboratively, and jointly construct a systematic whole of ethnic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the Sichuan-Yunnan region.

Keywords: Southern Silk Road; Sichuan-Yunnan region; ethnic culture;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责任编辑:胡金频